

琴与情的交织

——读儿童小说《手足琴》

□ 王一典 陈晖

赵丽宏在儿童小说新作《手足琴》(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23年6月出版,入选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发布的“中国好书”2023年6月推荐书目)中,又一次将目光投向熟悉的生活,在对童年的回望中谱写了一曲动人的乐章。

小说讲述主人公朱荞麦在偶然之中听到了弄堂隐秘之处传来的美妙小提琴声,让本就热爱音乐的他着了迷。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拮据的家境让荞麦的梦想遥不可及。但是,哥哥朱大麦为弟弟亲手改装制作了一把鹰头小提琴。同时,在林教授的启蒙和教导下,荞麦成为荣获国际大奖的中国年轻小提琴家,在小提琴的世界中尽情遨游……

音乐元素在近年出版的原创儿童小说中并不少见。不少作品不同程度涉及世界名曲、地方歌谣和乐理知识。相较而言,音乐在《手足琴》中并非简单的点缀,而是贯穿整个作品的重心。荞麦的成长历程与音乐息息相关:幼时听过的那场交响乐演奏点燃了他对音乐的热情,“国光牌”口琴让他能够真正吹奏出乐曲,而鹰头琴和瓜奈里小提琴则帮助他在世界小提琴家的殿堂中占有一席之地……

口琴和鹰头琴在荞麦的人生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也是小说题目的具体所指。母亲将自己年轻时吹过的口琴送给荞麦。但由于年久失修,口琴上的几个音已经吹不出来,因此吹出的曲子常常走调。荞麦对老口

琴的不满被大麦看在眼里,擅长制作航模的他,在仔细研究口琴的构造和发声原理后,利用手边的工具为口琴校音,让尘封多年的口琴重新发出悦耳的声音。鹰头琴是大麦在半把小提琴的基础上依照图纸装配而成的。“大麦做过很多航模,心细,眼明,手巧。比起做航模,制作小提琴的要求更高。那把残破的德国小提琴,是大麦制作新小提琴的基础。他用细砂皮一遍又一遍打磨小提琴的每一个配件,小心翼翼地把它一件一件组装起来。阁楼上,弥漫着胶水的气味。”在荞麦眼中,这把小提琴“就像是一只收起翅膀的雄鹰,正静静地停在树上,停在屋顶上,随时准备展翅飞翔。它也像是一架准备启航的飞机,停在跑道上,它的静默只是暂时的,有一天,它会发出轰鸣,会飞向天空”。这把小提琴倾注了大麦的心血,承载着兄弟俩的梦想,成为两人情感的象征。小说不仅写手足琴,更借此表现手足情。

除手足之情,作品中的母子之情同样令人动容。父亲去世后,母亲独自抚养兄弟俩,日子尽管艰难,但母亲没有抱怨,一人承担工作和家务的重任。大麦也十分懂事孝顺,会主动帮母亲分担家务,在她生日时为她送上礼物,用相同的方式报答母亲的关爱。

除了荞麦一家,小说还描写了同样住在福庆里的小排骨一家人和丝琪一家人。丝琪对七妹床铺的惊奇,小排骨对自家环境的自卑和荞麦等

人对丝琪家陈设的赞叹,都反映出几个孩子不同的生活境况。然而,音乐却让几个家境不同的孩子走到一起。丝琪发现了荞麦的音乐天赋,推荐他进入校合唱队。荞麦在屋顶上听到林教授拉小提琴,心生敬仰,用口琴吹出的曲调,获得林教授的赏识,成为他的弟子,并获赠了教授珍藏的瓜奈里小提琴。荞麦的口琴声为小排骨和七妹带去温暖、幸福。尽管大麦觉得年糕铺里纷乱嘈杂,但荞麦认为铺子里的声音悦耳动听,宛若音乐会的合唱。音乐像一条无形的纽带,维系着他们的情感。

音乐还具有净化心灵和穿越时空的魔力。原本有些调皮的黄毛,在迷上口琴后变得谦逊有礼,与之前判若两人。除此之外,作者还叙述了荞麦在睡梦中与扬科和帕格尼尼相遇。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笔下的扬科对小提琴的痴迷,出生于18世纪的意大利小提琴家帕格尼尼在作曲和演奏方面的才华,深刻地感染了荞麦。对音乐的热爱,对小提琴的渴望让荞麦穿越时空,与文学人物和历史人物对话,产生情感共鸣。

赵丽宏曾说当音乐家是自己最初的梦想。他用诗人的浪漫和乐者的深情,将荞麦的成长之路和与之相关的珍贵情感娓娓道来。正如书中林教授所言:“所有的音乐都是人情感的表达。”琴和情在小说中融为一体。人类深挚的情感,在音乐的境界中得到充分表达。

据《光明日报》



《手足琴》插图 资料图片



汪曾祺的小说“伎俩”

——读《岁寒三友》

□ 苏北



岁寒三友一般指松竹梅,汪曾祺《岁寒三友》则开宗明义,是指三个人:王瘦吾、陶虎臣、靳彝甫。谓此三人品行高洁也。

像《岁寒三友》这样一万字的小小说,得储备多少杂七杂八的知识才能写出来?我去年底又读了一遍,在书上做了好多批注,今天再读,仍然惊奇于它的好。汪曾祺的小说究竟要读多少遍,才是个够?

近看到一篇短文,认为一个好的作家,要能够有文学表达的精密度和分寸感。这其实是非常难的,而汪先生正是在此“精密”上,做得最好的作家。所以他的每一篇文章,才那么迷人。

这篇《岁寒三友》的故事,读者自己去看看就可以了。我说一点细小的东西。

首先这三个人名:王瘦吾、陶虎臣、靳彝甫。起这三个名字,汪先生是有所考虑的。王瘦吾是个开绒线店小铺子的,人也瘦,肩胛骨在长衫外都看得清楚,为人又忠厚老实,本分而生活清贫。陶虎臣是做炮仗店的,他的名字合他的职业。正如汪先生在文中所说“陶虎臣长得很敦实,跟他的名字很相称”。靳彝甫是个画家,不是那种大画家,他画画,也只能糊个口。他清高,生活有雅趣,生活虽半饥半饱,可有滋有味。天井里有花草,用莲子种出荷花,水里养一二分长的小鱼。

——汪曾祺没有一篇小说人物的名字没有经过仔细的考虑。如小说《金冬心》里的盐商就叫程雪门,《鉴赏家》里的大画家就叫季匋民,卖果子的就叫叶三,《鸡毛》里的

文嫂就叫文嫂,那偷文嫂鸡吃的经济系同学就叫金昌焕,《星期天》里的校长叫赵宗浚,而那个跳舞好的女的就叫王静仪。还有很多,汪先生的小说里人物的名字是非常有讲究的,有兴趣真可以编一份《汪曾祺小说人物表》。总的说,汪先生作品中的人物名字一般是偏雅的,但根据人物的身份,也有叫陈泥鳅、李三的。

在这篇小说里,汪先生将自己熟悉的生活尽情地往里面装,包括许多风俗。他实在是个喜欢写风俗的人,而且写得好,可完全融到小说中去,给小说增加了许多生气。在这篇小说里,比如,城镇里小生意人的生活场景,绒线店啊,炮仗店啊,小城画师啊。还有各种杂知识,比如关于绘画的(小城的画家和画师们)、民俗的(斗蟋蟀、放炮仗)。反正杂七杂八,汪先生说得都很有兴趣。

其次是小说结构。说结构,还真没有结构。汪先生也只是老老实实去写(仿佛极笨拙)。一块一块的,清清楚楚。说完一块,再去说另一块。先介绍王家绒线店、陶家炮仗店和靳彝甫画店(包括靳彝甫祖传的三块田黄)。再写三人都交了点好运。王家开了草帽厂、陶家那年炮仗生意不错,靳彝甫斗蟋蟀挣了点小钱,又遇见了季匋民(要买他的田黄,靳说,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卖的,此处为下文埋下伏笔),推荐他办画展,建议他出去见见世面、开阔眼界。

小说一转折,只用了四个字:这三年啊!王瘦吾的草帽厂的生意被人挤了,陶虎臣炮仗店没了生意,家里断了炊,嫁(卖)了

女儿,女儿得了病。正在两家已经活不下去了的时候,靳彝甫回来了。靳彝甫咬牙卖掉了三块田黄,接济两家。这样的交往,当然寄托了汪曾祺的人生理想,也颇具古风,有一种“但使风俗淳”的意味。当然,这也只是汪曾祺的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而已。

这样的小说写法,就使得人物交集很少,正面写到王、陶、靳三人的接触只有三次(一次靳彝甫上门送匾,两次小聚)。因为汪先生说得,说得有意味,说得深情,读者不费劲就读下去了,而且在不知不觉中给小说中的人物牵着走,读完还意犹未尽。虽然直接写三个人交接的地方少,但读者又无时无刻不感到他们在交流,无字处皆有字也。

这篇小说实在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小说,它不是按常理出牌的。你可以说是别出心裁。别出心裁的好处是写出了特色,但也颇有难处,还要有识货的人欣赏它。

前不久在高邮,和学者杨早去看望年近九旬的金家瑜先生。金是汪先生的妹婿,他一辈子的职业是医生。金先生见到我们,交流了一会儿,他即很认真地询问起一件事来。他对杨早说:

“给您说个事。”

杨早:“您说。”

金:“汪先生的《岁寒三友》能不能拍个电影?他的温暖程度不亚于《茶馆》。”不知道金先生为什么用“温暖”这个词。

金先生接着说,“有一年在北京,大嫂问大哥,陆文夫的《美食家》拍成了电影,你的小说什么时候拍成电影?大哥说,我的小说

不好拍。”

这让我想起同是在高邮,见到同样也是汪迷的张国真先生。张先生聊起有一年在先生家,他非常直接地问先生:“如果改编您的小说拍电影,应该选择哪位导演更合适?”汪先生向烟灰缸里掐灭烟头,戏谑而平静地说:“请斯皮尔伯格导演合适。”

想想当年《岁寒三友》发表的经过,已经够费劲的了。还奢谈拍电影。先是汪先生托一个同事带给《十月》杂志(这位同事有个同学在《十月》工作,这位同事还特意骑车送了过去),过了一阵没有消息。汪先生叫他给问问,《十月》的那位同学说,这个小说写的主题是什么?意思是不好发,便退了回来。过一阵,汪先生在《北京文学》上发表的《受戒》有了点影响。《十月》的主编一次到京剧院来,又将稿子要了回去,发在了1981年《十月》的第3期上。想想也真是有意思。那一期同汪先生一起发表的那些小说,早没人议论了,而这篇《岁寒三友》,却多年来不断被人谈起。真是“解人”不易呀!同时也可设想一下,汪先生那时的寂寞和孤独。

在这篇小说中,我也看出一点小小的不足。最后嫁给那个驻军连长的是陶虎臣的女儿。可在小说中只写到王瘦吾的女儿,对陶虎臣的儿女一字未提,最后忽然冒出一个女儿来,有点突兀。总之不太完美。我这点小小意见,如果汪先生能够知道,我想该会同意的吧?

据光明网